

《中国观察之椿桦专栏》

治教辅书腐败光靠发文件不行



由权力推动,多个机构从中分食高额利润,最终由学生家长埋单,在清晰可见的教辅书暴利产业链条下,义务教育正面临被蚕食和破坏的危机。对于积重难返的教辅书暴利产业链问题,看来,光靠教育部的文件已经解决不了问题,应当由纪检部门介入,涉及商业贿赂及腐败的,更应该深挖。

都知道眼下中小学生的书包越来越重,相应的,家长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。原因还是老生常谈,学生教辅材料多了,家长都在花钱给孩子买负担,而这种花费往往都是“自愿”的。六一儿童节这天,《经济参考报》推出深度报道,称记者在安徽调查发现,在包括省教育厅在内的行政力量推动下,形形色色的教辅书充斥中小学校,各校仅用家长签字的一张订书单,就顺理成章地继续进行着“统一征订”,多个机构从中分食高额利润。在清晰可见的教辅书暴利产业链条下,义务教育正面临被蚕食和破坏的危机。

如大家所知,学生并没有独

立的经济来源,但是有孩子的地方,必有利益集团的虎视眈眈。连一些自命社会良心的作家都不放过分肥之机。譬如,上回郑渊洁声称退出作协,据说就是因为看不惯作协某作家跑到小学去签名售书,不屑与其为伍。作家姑且如此,更别说掌握了教育资源的管理者了。

摊派教辅书这种事儿,说起来当属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。不同的是,现在摊派的手法有所创新,譬如,教育管理部门及其学校都反复强调,认购教辅书,纯属自愿。这种“被自愿”其实跟所谓“赞助费”一样,其内涵大家都心知肚明,基本都是弱者赞助强者,

语义颠倒且又约定俗成。我建议将来修订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时,将这两个词及释义也补充进去。

教辅书背后的利益链条,其实早已表面化。出版行业内人士所称“潜规则”,完全可用“显规则”来表述——地方行政权力都直接介入其中了,还不够明显吗?业内人士爆料说,省新华书店拿到出版社50%的发行折扣之后,会分出约25%的折扣利润给各地市、县区教育局及乡镇学校三级教育部门(地市约为5%,县区约为5%,乡镇学校约为15%),以达到让各级教育机构将教辅书推广进校之目的。此爆料基本可说没什么新意,世上有不正之风不足为奇,但当一种不正之风发展成“明规则”,甚至一种产业,那就更有伤公众感情了。

所以,一旦地方利益部门彼此勾结,相互分肥,事情就会变得难以收拾——在利益面前,再文明的人士往往也文明不起来。早在2001年,新闻出版总署、教育部印发了《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

法》,严禁将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编入《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》。之后,教育部几乎每年还会发文强调一下这个“严禁”。加上省级教育部门的“严禁”,绝对够得上三令五申。但现实情景大家都看到了:越减负,负越重,腐也越重。

显而易见,教辅书已经变异为“教腐书”,它教坏了一大批权力者、出版者、发行者及教育者,同时也多少会影响到被教育者。许多年龄稍大的孩子,基本都懂得这种幕后利益链条的“好处”所在。此外,教辅书中的不少粗制滥造、差错连篇之作,也代表着有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良知完全坏掉,这样的书,没把孩子们都教坏,实乃不幸中的大幸。

所以,对于积重难返的教辅书暴利产业链问题,应当由纪检部门介入,涉及商业贿赂及腐败的,更应该深挖。“广东英德市教育局局长被抓,近百校长自首”的事例启示我们,治教育腐败不能靠文件,要动刑。

(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)

《第二落点》

教育部门和学校应远离教辅书选购

既然高考模式没变,教辅书就有其价值。最大程度发挥教辅功用,同时避免其成为吸金工具,这才是问题的核心。过往,官方试图通过还原个体的“自由选购权”来剥离教辅的负面影响。但现实看来,这样的努力收效甚微。一方面,教辅市场良莠不齐,家长与学生都不具备必要的甄别能力。这就决定了其购书行为不会完全“自由”,必会寻求意见领袖的权

威意见。另一方面,教育部门与校方主动充当了这个权威角色,不仅开列了“参考书单”,而且据此安排教学进程。尽管学生获得了名义上的选购自由,但仍只能在被圈定的范围内行使“消费自主权”。

购买教辅,确实需要相关领域意见领袖的指导。这种基于权威地位的“意见供应”,如何不被异化为“隐性强迫”是真正需要思考的方面。事实上,安徽教辅产

业链的重要一环,就是省级教研机构将自己的“部门权威”变现牟利,通过划定所谓《安徽中小学学生作业目录》的方式实现利益均沾。此举诚可谓荒唐,一个购书指导者居然与特定书商有着共同利益,又怎能奢望其给出客观的参考意见呢?

基础教育关乎国民素质,历来是优先考虑的领域。当下一代成为利益联盟榨取的对象,当教

育成为家长的沉重负担,现实注定让人失望。可以想见,教辅书还会长期存在。它有自身的价值,也有庞大的信众。教辅产业之暴利,想必不能通过那只“看不见的手”控干。公众期待职能部门更多作为:首先,组织利益中立、去权力化的购书指导团队;再者,明确课堂教学与课后作业与教辅资料脱钩。自此基础上,教辅书方能回归其“辅人”之本性。(蒋璟璠)

《第三只眼》

也应该给教辅书价格彻底挤挤水

相关部门在铲除教辅腐败的同时,千万别忘了挤挤教辅价格中的巨大水分。从相关媒体披露的一些数据来看,现在的教辅定价高得吓人,动辄数十元。而在高定价的背后,是疯狂的回扣。行情一般是,学校按定价的100%卖书给学生,书商按码洋的15%至25%折扣给学校,出

版商以6.5折至7.5折卖给书商,出版商的成本只占到书价的三四成。如果能把虚高的教辅价格打压下去,不仅暴利没了,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轻了,更为主要的是,教辅“蚕食链条”就会难以维持,“教辅腐败”就会失去滋生的土壤,可谓一举数得。

教辅资料作为实施国民教

育的一个组成部分,本应具有公益性、无利性,最起码价格不能胡来。因此,我的意见是,国家可设立教辅书审查机制,对各类教辅书进行出版前的审查。一方面要审查内容,凡与课程标准不相符、与教材不同步的;凡题量大,不符合课程标准少做题、多读书的基本要求的;凡讲解越俎代

庖,取代了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过程,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的;凡题型陈旧、题目过难、简单重复多,差错多的……一律将拒之门外,不许出版上市,以纯净教辅市场。另一方面,更要审查价格,严格核算成本,只许微利,杜绝暴利。

(吴云海)

《热点纵论》

油价涨得快跌得慢,谁说是“片面理解”

6月1日,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谈到油气价格调整时说,有网友提出“中国油价涨得快跌得慢”,这是对成品油价格机制的片面理解。国内成品油价格变化,主要依据国际油价的变化,近一个月国际油价走低,为成品油价下调提供了空间。

这番话的背景是:自6月1日起,汽、柴油供应价每吨分别降低

230元和220元。不管怎么说,在农副产品涨价风起云涌的情况下,汽车的“口粮”价格下跌,总归是好事。但听到周所长这番话,总觉得心里憋屈得慌,对“中国油价涨得快跌得慢”这一事实,周所长认为人们是片面理解,我实在不得不再“片面”一二。

按周所长的说法,国内油价变化,主要依据国际油价的变化。

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,就是“国际油价涨国内则涨,国际油价降则国内降”,涨或降的幅度也应该大致“与国际接轨”吧,下面是我从官方网站查找的一组数据,我们也来“让事实说话”。

2007年11月1日国际油价93.51美元/桶,国内汽油价是5480元/吨,到2008年6月20日,国际原油价猛涨到135.36美元/桶,

国内汽油价也相应涨至6480元/吨。此后,国际原油价一路跌到2008年12月17日的仅40.26美元/桶,不到2008年6月20日的1/3,而国内此时的汽油价5540元/吨,降倒是降了,可仍然比2007年11月1日高出60元/吨。如果按照现在降价后的价格来看,就更让人不可思议,在国际原油价135.36美元/桶时,国内汽油价是6480元/吨,现在国际原油价是74.35美元/桶,而我们6月1日降价后的汽油价是7190元/吨,不知道周所长该给我们一个怎样的合理解释?

以北京汽油价为例,从2009年3月至今,6次涨价每次每升提价幅度都在0.20元以上,最低0.23元最高0.48元。降了三次价,一次是0.15元,两次是0.18元,没超过每升0.20元,降价和涨价相比,不仅次数少一半,幅度也低得多,这“涨得快跌得慢”是“秃子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的事”,真不知道我们该怎样“正确理解”。

本来就是涨得快降得慢,反说我们是理解片面,上面几组数据,无论是“国际接轨说”还是“市场运作说”恐怕都难以自圆其说。但对此次降价,我们还是假装欢呼一回,说不定人家一高兴,还会接着降。(朱永华)

最新糖尿病康复书籍《向健康人学习,化解血糖不吃药》一书

免费向糖尿病患者发放

近日,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《向健康人学习,化解血糖不吃药》一书,由于观点新颖,学术严谨,受到了糖尿病患者的热烈欢迎。

该书认为:一个健康的人之所以能够大吃大喝而不怕血糖升高,是因为及时地将血糖转化成了营养和能量!他不是降低血糖而是化血糖!所以,治疗糖尿病,我们应该向健康人学习,恢复化糖本能,同时该书对目前最新糖尿病治疗手段“化糖疗法”做了详尽的介绍。

①化糖疗法首先是可以不打针、不吃药,轻松治疗糖尿病!②不进入肠胃、不伤肝肾,真的安全无药害!③能吃能喝不忌口,3-7天浑身有劲、饭量增加,起夜次数减少,眼睛明亮,瘙痒麻木消失。

为了让我省广大糖尿病患者掌握最新的康复知识,早日康复,中国糖尿病康复指导中心特决定在我省免费发放《化解血糖不吃药》一书,由于数量有限,请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拨打发放电话400-710-3345进行免费索取。

《新华时评》

选官多些透明才能多些公正

近日,重庆市北碚区在公选27名副处级干部面试过程中,实行全程录像监控,每个面试室内,评委分别由8名考官和8名群众组成,面试题均从中组部考试题库中抽取,面试完当场公布成绩。公开透明的面试选拔,让这次干部公选变得更加公平公正。

试卷面前,人人平等。密封试卷和标准答案堵住了人为因素的干扰,但面试环节的考官评价,仍存在人为操作的空间和其他因素干扰的可能。如何在面试环节体现公正公平,对于整个公选考试的公平公正至关重要。重庆市北碚区的做法,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实践。

通过公开考试进行干部选拔,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。近年来,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通过考试走上领导岗位。实践证明,科学、公开的考试,有利于发现人才、选贤任能,是形成人才脱颖而出生动局面的有力推手。但毋庸讳言,一些地方干部公选考试中的面试环节,还存在考官构成不合理,面试过程不透明,评价标准不科学等问题。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干部公选的科学性和公信力,也导致社会上对暗箱操作和潜规则的“合理想象”。

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,北碚区增设群众评委,规范考题,并当场宣布成绩的做法值得称道。不过,群众评委的成绩只占10%,这个比例是否偏小?8名考官事前有没有与应试者密切接触?他们的公正性和专业性如何体现?这些追问,都还需要有更进一步的探讨思考和更加缜密的制度设计。

古语道: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。建立和完善更加科学合理、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、干部选任制度,不仅关乎发现人才、使用干部的问题,更关乎在全社会形成公平竞争、唯才是举的良好风气。让更多人才在阳光下涌现,我们的社会就能多一些和谐公正。

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

《公民发言》

强拆官员获刑只是一个偶然

安徽阜阳一起违法强拆事件中,一名业主自杀。事后,授权强拆的副区长曹颖章被问责,他同时被查出收受了贿赂,今年4月被判刑11年。官员因强拆被问责,这起事件被认为开了先河。(6月1日《新京报》)

强拆官员获刑的“先例”,在暴力的拆迁迷雾中提醒我们:只要法律得到真正的尊重和执行,屡屡弄出人命的强拆其实完全可以得到遏制。那么,那么多权力主导的强拆中,执法者有没有对幕后的官员进行过调查?他们滥用职权了吗?他们收受贿赂了吗?以最近被曝出的河北广平“10天完成33万多平方米拆迁任务”的超速拆迁为例,根本就未签署补偿协议,也未对民众进行妥善安置,焉能不是滥用职权?怎么就未见官员被定罪呢?再看那些动辄由身份不明之人进行的强拆,不是有权力撑腰,怎敢如此胆大妄为?所以一句话,不是查不出问题,而是根本就不想查。

这时再来看阜阳强拆官员获刑,恐怕就兴奋不起来了,因为那似乎更像是特事特办的结果,不具有被广泛复制的可能。众所周知,阜阳这些年出了不少“负面新闻”,从大头娃娃到白官书记,甚至堪称官场从上到下烂透了,为此省里面空降了一位新书记,而曹颖章的获刑正与新书记“对拆迁过程的合法性进行调查”的批示直接相关。换言之,这个时候,法治的结果离不开领导的批示,没批示可能就没调查,没调查当然更不会有官员获刑。这到底该算法治还是人治呢?

这就好像,法治程序存在一个启动按钮,而这个启动按钮不由法律文本以及公民控诉来掌握,而是牢牢攥在更高权力手中。如此,强拆官员获刑怎能不是一种偶然?(舒圣祥)